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

晏学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/晏学著. —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220-08422-5

I. ①曹… II. ①晏… III. ①曹禺(1910~1996)—戏剧
文学—人物评论—文集 IV. ①I207.3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2322 号

CAOYU HE TADE XIJU RENWU

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

晏学著

责任编辑	许茜
装帧设计	杨潮
责任校对	徐英
责任印制	李剑 孔凌凌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	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://www.scpph.com 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 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86259459 86259455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86259524
照 排	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70mm×240mm
印 张	16.5
插 页	3
字 数	200千
版 次	2011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0-08422-5
定 价	36.00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(028)86259624

“沉在心里”的怀念

——晏学著《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》序

徐晓钟

晏学老师——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，是一位为历届学生所挚爱的老师。除“文化大革命”（以下简称“文革”）期间外，她执教50年。教“写作课”、“话剧名著选读”；讲“郭沫若”、“田汉”和“老舍”，主要讲“夏衍”和“曹禺”。她从26岁走上讲台，第一课就是讲曹禺的《雷雨》，她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课堂上讲曹禺的作品整整40年。

晏学老师在教学的同时写过舞台剧、电影及电视剧：《忘忧草》《赣水苍茫》《袁世凯》等；1980年为“北京人艺”写了话剧《芡芡草》（由夏淳和苏民导演）；2004年，纪念戏剧“梅花奖”创立30周年作为庆典演出《雷雨》时我请她为我们担任文学顾问，同时她还在北京及外地学校讲授曹禺专题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她的全部讲稿被当做“封资修”“毒草”扫地出门，一张讲稿也没有留下。后来是学生催着要她补写出课堂的讲稿，她才补写出来一些。

在这本题名为《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》文集中，她精辟地论述了曹禺对自己剧本题材的选择、人物的设置以及表现社会生活的角度和剧本场景的确定；她对曹禺剧作语言的分析也十分精彩，她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曹禺语言的文学性、诗的韵律与“极富于变化和情趣”；最终概括出曹禺剧作的表现方法、艺术风格和

曹禺
和他的戏剧人物

晏学教授给学生上课

他坚守的戏剧观念。我以为，文集作者论述的焦点仍是集中在对曹禺剧作中的人物，特别是对人物心灵的分析，作者把学生和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对曹禺作品人物精神灵魂的剖析。

晏学老师读曹禺有自己的视角，观点深刻，用词犀利，文字也美。她从曹禺剧本的细节分析出人物形象的内涵，分析出作家对人性真谛的沉吟，最后凝炼出剧本的哲思，深深钻进了曹禺写作的心灵。她是以丰富、敏感的情感去解读和感悟曹禺笔下的人物的。她深切地感受到曹禺是“以熔铸了自己强烈爱憎的作品向反动的统治势力挑战”；感受到曹禺是“以自己的生活与技巧，思考与激情，天才与勤奋三者的统一，使自己的作品‘一鸣惊人’”。她说：“我作为曹禺老师的学生，我只有认真再钻研老师的作品，并把我的点滴体会，告诉我的学生。”她真诚地说：“这也许是我对老师能作出的唯一的报答和纪念。”

晏学教授和学生合影

启迪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戏剧文学财富，如何走近一位世界现代戏剧的卓越代表人物、我们的老师——曹禺，如何倾听他的心灵！从这些文学鉴赏、解读、评论和已经形成教材的文字中我仿佛看到一种蕴涵：看到作者对我国文学财富，对一位文学大师，对自己的老师的挚爱！

晏学教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《怀念曹禺老师》中写道，“让一切又沉在心里”。我在她的讲课和这本文集中似乎听到了她对我们的老院长，对我们的老师——曹禺的“沉在心里”的怀念！

徐晓钟

2011年3月8日

徐晓钟（1928～），中国戏剧教育家，话剧导演艺术家，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，中国剧协第四届副主席，国务院

003

曹
易
和他的戏剧人物

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，国际剧协教育委员会委员，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。

曾先后执导话剧《麦克白》《培尔·金特》《桑树坪纪事》等，在国内话剧界反响巨大。著有《导演基础知识》《导演艺术的特性与导演职能》等导演学专著。

目 录

“沉在心里”的怀念

- 晏学著《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》序…………… 徐晓钟 001
- 怀念曹禺老师…………… 001
- 将军笔下开生面
- 戏剧大师曹禺…………… 011
- 《雷雨》的启示…………… 029
- 他是什么人？
- 解读周朴园…………… 059
- 繁漪与周萍…………… 080
- 爱之罪
- 侍萍与四风母女的血路…………… 105
- 一心想飞的孩子
- 活在梦里的周冲…………… 116
- 这就是奴才
- 说鲁贵…………… 126
- 《日出》的构思艺术…………… 136
- 陈白露的悲剧…………… 157

曹禺
和他的戏剧人物

在浊浪中翻滚	
——李石清的挣扎·····	183
《原野》删改得失谈·····	196
挣不脱无形的镣铐	
——仇虎的悲剧·····	204
哀·文清·····	216
学习曹禺戏剧创作的点滴	
——和同学们关于写戏的谈话·····	227
跋·····	256

怀念曹禺老师

曹禺老师去世一年多了。我早就想写下我的怀念，但一拿起笔，思绪就像乱云一样翻涌，许多回忆、许多联想都萦绕在脑子里，理不出一个头绪，不知该从哪儿说起，于是几次提笔，几次放下，让一切又沉在心里。

时日匆匆，又一年了，我不再去整理思绪，一任它流淌，就断断续续地写下去。

曹禺老师的去世，对我来说又突然，又不意外。说是不意外，因为曹禺老师毕竟 85 岁高龄了，而且长年住在医院里。说突然，是因为他在住院期间，我们常去看望他，他精神一直很好。开头那两年，每次我们探望完起身告辞时，他总是要步行送我们到电梯口，直看到电梯门关上。后来这两年就坐在轮椅上仍然要送我们到电梯口。劝阻无效，每次必送。但看老师精神好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最后一次去探望，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，他精神仍然很好，而且看上去还胖了些，陪他住院的小白说：“因为透析后，吃东西的限制少了些，所以胖了。”这一次因为是冬天，我们坚持不让送到电梯口，就在门口道别，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。

1996 年 12 月初，因为祝贺《曹禺全集》出版，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小型的集会，我们本来以为老师也许会出席（他住院期

间有时也出席一些必要的会议)，结果没有来。他妻子李玉茹告诉大家：“曹禺同志要养精蓄锐准备出席第六次文代会。”大家也很释然。会后我还特别问了问李玉茹同志，曹禺老师的身体到底怎么样？玉茹同志说：“挺稳定。”我又一次放心了。所以当12月13日早晨徐晓钟院长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曹禺老师在凌晨去世时，我愕然了，“怎么会呢？”但这毕竟是铁一般冷酷的事实。

原本说，“文代会”之后再去看望曹禺老师，而再见已经是在八宝山的告别大厅里。当我向静卧在鲜花翠柏中的老师致最后敬礼的时候，模糊的泪眼却使我无法清晰地再看一看老师的遗容。

我认识曹禺老师是在1953年，那年我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。那时曹禺老师是学院的副院长，据说还分管戏剧文学系，但他很少到系里来，倒是常在全院大会上看见他。因为他是院里最年轻的副院长，所以每当开学、结业，经常由他主持。那时，他40刚出头，精干、洒脱、瘦瘦的、一头黑发，眼镜后面有一双睿智的大眼睛。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清晰、明亮、没有杂音，因为演过戏，也会用嗓子，因此他主持大会不用高声就能传得很远。大家很爱听他讲话，但他很少讲话。他很尊重几位年长于他的院长，所以每次宣布开会之后，他都很恭敬地请欧阳予倩老院长讲话，然后他自己退到主席台的边位上悄悄地坐下，一点也没有“名人”“大艺术家”的神气架子。

当时他不常讲课，我记得只在大教室讲过他自己翻译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关于他自己的作品，他几乎闭口不谈，就是和戏剧文学系的学生座谈创作时，也只讲“要深入生活”和一般的创作规律。后来我明白了，那时他对自己过去的创作方法，如何“表现新生活、新人物”也存有疑虑，因此不肯多说。

那时的期末考试，许多学科都是抽签口试。我们都戏称这种口试为“三堂会审”。因为参加考试的老师除了主讲老师、系里的党政领导外，还有教务处和院里的领导及旁听的老师，有时“考官”就坐两大排，阵势挺吓人的。二年级考“俄苏文学”的那天，曹禹老师也来了，原本就让同学发憊的考试，就更添了几分紧张。还好，前边几个考完出来的同学说：“曹禹老师光听不提问。”这让人松了一口气。“俄苏文学”是我最喜欢的课程，按今天话说是我的“强项”。我抽的题目是阐述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中“奥涅金”的形象，这又是我自认为最拿手的，所以我进考场时，不十分紧张。我放下题签，就按自己准备的答案低着头一口气说下去。说着说着我突然觉得“怎么没有一点声音？”我猛抬头一看，正看见曹禹老师闭着眼睛。我顿时慌了，信心全跑了，心想：“一定是我说的都是废话，他听得不耐烦睡着了。”就在我愣神的那一瞬间，曹禹老师睁开了眼睛，并且轻声地说：“怎么不说下去了？”我嗫嚅地：“我答得不好，您都睡……”没有等我说完，他爽朗地笑了。“我哪睡着了，闭着眼睛听才专注嘛！快说下去。”其他老师也笑了。我收回神，硬着头皮答下去。临出考场，曹禹老师又说了几句夸奖的话，我知道是安慰我，就逃也似的离开了考场。结果这次考试不但得了高分，而且不久就传出“小道消息”，说院领导认为我是个“教书的材料”。果然，一毕业我就被留校做了教员。从此也就不敢再做我来上学时想当作家的梦了。

说来也是缘分，我登上讲台，开课第一讲就是曹禹老师的《雷雨》。

我留校原本是做“俄苏文学”的助教，但到1958年。中苏关系失和，“俄苏文学”课程也削减了，又正赶上大刮“厚今薄古”的风。为了追形势，系领导决定：不论是教中国古典文学、

晏学教授给外国留学生上课

戏剧的，还是教外国文学、戏剧的，年轻的教员一律都要讲“当代的新剧目”。于是教古典的讲起了《降龙伏虎》，教外国的就讲《烈火红心》，纷纷抓一个“大跃进”时期的新剧目。我当时正按助教的进修计划在写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作品的论文，这时也要求我放下手头的东西开课。可我讲什么呢？我认为那些新剧目学生一看就懂，根本不需要讲，我刚当完学生，我知道学生不爱听。于是我决定选《雷雨》。《雷雨》当时不是“新剧目”，但曹禺是“当代作家”，他的作品当然也算“当代”的，既是“当代”自然也该算在“厚今”的范畴。这虽然有点诡辩，系领导也只好勉强同意了。所以我第一次走上讲台，开始教书生涯。第一讲就是《雷雨》。算起来曹禺老师的作品我至今整整讲了40年。

当“厚今薄古”之风刮过去，其他教员各回原位之后，我却被定位在“名著选读”的课程上，专讲五四以来话剧名著。后来高年级学生开“作家研究”课，我又主讲“曹禺”和“夏衍”。

有的说我讲课有“人性论”，有的说“阶级观点模糊”……到“文革”前还上升为“修正主义”。我很感谢我的历届学生，他们一直支持我，使我自信讲得“没错”。可是自从新中国成立后，曹禹老师几乎每次作品再版都要修改，对有些版本我是有意见的，因而我一直用的是巴金主持的“文化生活”版。为此，我第一次大胆地去拜访曹禹老师。那时他住在张自忠路，我们俗称“铁三号”的平房里。他在一间十分狭小的书房里接见了，坐在临窗的不大的写字台后面听着我说，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神情，平易、和蔼。甚至在我率直地说出我对“开明”版等修改的不同意见时，他也只是点点头，毫无怪罪我莽撞之意。他对我对他作品的讲解，也没有提出异议，反而很肯定地说：“就按你的理解讲吧，我很同意。”其后在许多场合，他提到我讲课时都表示满意，这是我教书以来最大的安慰。

当我说到“名著选读”中还要讲郭沫若、田汉、夏衍和老舍的剧作时，他连连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应该讲，他们的东西比我的好，要多讲，多讲。”他还说到他年轻时非常喜欢郭老的《女神》，拿着郭老的诗，就激动地想大喊：“我是一只天狗哇！……”他讲时神情非常年轻。他还说到巴金，说巴金比他年长，可他们“心相通”。他说：“巴金写《家》是‘控诉’，而我写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是‘抗争’。我们都对那个旧世界憎恶，恨不得它赶快毁灭。”他还谈到了他剧本中的人物原型和他当时的思想情绪……

这一次拜访，我最大的收获是坚定了我讲课的信心，而令我最感动的是他这样一位大作家居然对一个小助教那样亲切、坦诚。

曹禹老师的“好说话”、“随和”是出了名的。不论哪一个团体要演他的本子，他对主创人员都说：“你们可以改，可以删。

我的剧本太长。”等等。也不论哪一个剧团演出了他的本子，演的情形怎样，他也总是给予鼓励。有的说“很好”，有的说“不易”。为此，文艺界的朋友时有微辞，认为他明知道“不怎么样”而肯定得太多。一次谈话时，他说起：“你知道吗？有人能在一个半小时演完《雷雨》，真厉害！”那神情分明是无可奈何。我也就顺便谈起，对他总肯定他原本不满意的剧本和演出，朋友们是有意见的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不如老巴。”（他平时称巴金先生为“老巴”）这沉重的自责，使我一下子沉重得说不出话来。后来他又徐徐说道：“一个剧团演个戏不容易，进趟京更不容易……”他就是为剧团着想，有时才违心地说好话。但是有人就利用他的“随和”“好说话”，打着他的旗号，对他的剧本胡删乱改，以致除了剧名保留而外，内容全部不是曹禺老师的。怎么能这样对待曹禺老师的心血、我们民族的瑰宝呢？这不是欺世盗名吗？难怪一位研究曹禺的专家曾激愤地痛责：“这是强奸了名著，还要卖钱！”

就是这么随和、宽容的曹禺老师，“文革”中也难逃厄运。他被批斗、示众。爱妻方瑞亡故，女儿离散，身心受到极大摧残。他在“北京人艺”怎么批斗我没看见，但有一次学院造反派把他“揪”来“陪斗”我却是亲眼所见。那是1967年的1月9号。此前不久，江青在一次“讲话”中甩着哭腔煽动合同工和临时工造反，于是学院造反派在1月9号召开了工人斗行政干部的大会。这事本与曹禺老师无关，他从来也没管过学院的行政，但他被“揪”来了“陪斗”。在办公四楼小礼堂，造反派高坐在舞台上的主席台，曹禺老师和其他被斗的人在台下站成一排。曹禺老师显然事先不知道批斗的内容，开头他只是低着头听着，而当一工人冲上去打了一个跪着的干部时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着那打人和被打的。那眼神是惊痛，是惶惑，还是悲愤，我无法形

容，但却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一瞬间，记住了面对野蛮的那双眼睛。批斗会临散会时造反派发了“勒令”：要曹禹老师每天到学校来听候“批判”。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红卫兵一造反，就把教员都赶出了“办公楼”。有“官衔”的，都进了“黑帮队”和“劳改队”，其他教员按各自观点加入了“天派”“地派”；而我和几个“无党无派”的中青年教员无处栖身，就在背静的东院旧教室楼下找了一间屋子“上班”。这间屋子正对着堆煤的东小院。“1·9”斗争会后第二天一“上班”，就看见曹禹老师站在东小院煤堆旁的雪地上。那时“勒令”也多，三个人扯旗造反就敢发“勒令”，因此我们就不以为然了，没想到这一“勒令”，曹禹老师居然来了。那个冬天似乎特别冷，地上的积雪都没有化，曹禹老师孤零零、瑟缩地站在雪地里等候命令。其实造反派发完威风，早把这事忘了，又“抓大事”去了。可曹禹老师不知道这种情形，那他要站多久哇？我们几个人一嘀咕：东小院也没人看见，赶快让他回去吧，要是让造反派看见他，没事也得找茬折磨他。于是我就出去悄悄对他说：“先回去吧，他们早把这事忘了。”他疑惑地看着我，那神情是：“行吗？”我说：“大不了有事再揪来，不必傻等着哇！”他终于相信只好如此了，就点点头，一言未发，踩着雪悄悄地走了。我们始终没敢让他到屋里暖和一下，淫威下人是多么怯懦呀！后来，我们也放下了。劳改、挨整，自顾不暇，也很少想到曹禹老师。再见面已经是“四人帮”垮台之后了。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举行的一次纪念周总理的朗诵会，曹禹老师出席了，那时他才六十几岁，但十年磨难，他被折磨得步履蹒跚，是他女儿万方扶着他才走上台的。多想再听他那悦耳的朗诵声音哇，但他没有力气，是万方代他读的，他献给周总理的是一颗真诚的怀念之心。

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，他又拿笔了。当“四人帮”把他的

曹禺
和他的戏剧人物

作品都打成“毒草”的时候，他曾发誓以后就是扫大街，也不再写东西。可是他不能有负周总理的嘱托，要写一个民族团结的本子。于是他拿起了笔，写了一个“笑嘻嘻的王昭君”。虽然大家都为他能再次拿起笔而欣喜，但对《王昭君》是褒贬不一的，我也认为他创作的“孙美人”简直是神来之笔，但整体来说《王昭君》的创作，他没能超越过去的自己，反而有明显的

晏学教授带留学生去探望曹禺老师

那个时代创作方法的痕迹。我率直地告诉曹禺老师，作为学生我不希望一曲《王昭君》是他毕生从事创作的压轴戏。他也说：“还要写，还要写。”

提起《王昭君》还有一个小插曲。一次我到木樨地（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部长楼所在地）去给他送他向学院借的书。那天他夫人李玉茹同志不在（好像是回上海了）。在谈到《王昭君》时，我贸然地问了一句：“您写的呼韩邪单于在玉人像前谈迎娶昭君的那段台词，是不是想到了方瑞？单于和玉人说的，是不是就是您想和方瑞说的？他娶了昭君，而您和李玉茹同志结了婚？”曹禺老师听了之后，怔了一下神，然后反问我一句：“你这么体会？”我笑着点了点头。他说：“也许是，也不尽然。”他没再说这

段台词，却谈起了和李玉茹同志早就相识，以及1946年、1948年方瑞与李玉茹同志相识、相交的情形。我作为一个学生贸然地问起老师个人感情和生活上的事，虽说是由《王昭君》引起，也是很鲁莽、不礼貌的，但曹禺老师不以为然，反而平易地说起家常。

最后这几年，他一直住在医院里，但他不像个病人，他关心文艺界，关心学院，关心学生。床头桌上还总是放着一些书。一次我们去看望他时，碰见胡绳同志去看他，他马上提到胡绳同志的著作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》，说他很想看，胡绳同志答应派人送来。徐晓钟同志在学院给学生排了《樱桃园》，曹禺老师是很喜欢契诃夫的戏的，他说：“我现在不能坐几个钟头看戏了。”晓钟同志说给他送来录像带，他很高兴，说可以慢慢地看。每次晓钟同志去都向他汇报学院的事情。他认真地听，十分关切。而让我最感动的是他对年轻学生的态度。有几次我是带着在学院进修的外国留学生去的，有法国人、日本人、斯洛伐克人和中东的人。他们都是跟着我学曹禺老师作品的，也都想去看望一下曹禺老师。可临去那天，有的紧张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下，我说：“别紧张，他是位很随和的好老头。”可他们一想是“大作家”心里还是打鼓。等到医院一看曹禺老师慈眉善目的样子和他亲切的接待，他们的紧张解除了。他接受他们的献花，和他们一起照相，给他们在《曹禺剧作》上题名，还和日本学生说她的名字在中文的意思。当学生说非常喜欢他的剧本，甚至想演其中角色时，他突然问道：“你们懂得什么是‘三不管’吗？”当学生的回答让他满意时，他开心地笑了。每一次都是我怕老师太累，才把学生带走，他们是那样恋恋不舍，真挚地祝福曹禺老师早日康复。

我更是希望有奇迹出现，他能再拿起笔。天不遂人愿，曹禺老师终于没能再拿起笔，这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遗憾。